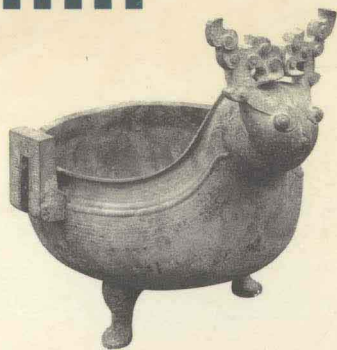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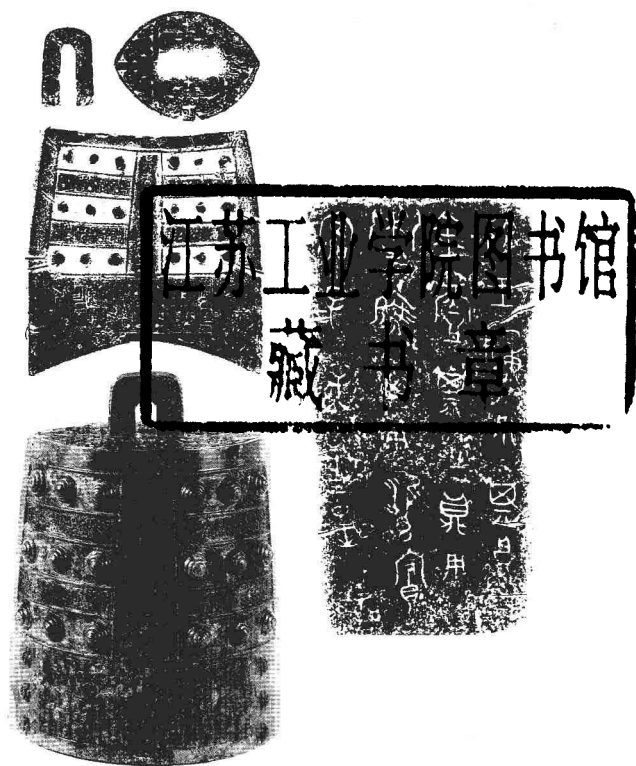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孔令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孔令远 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7
ISBN 7-5034-1634-3

I. 徐… II. 孔… III. 考古发现-邳州市
IV. K87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035 号

责任编辑:刘 剑 封面设计:刘梁伟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61000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前 言

在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商周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徐国，文献中称徐方或徐戎、徐夷，相传是少昊氏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徐夷在东夷族中是势力最强的一支，是商代晚期帝乙和帝辛的征伐对象和掠夺财富的目标。西周时期，其势力向淮河流域扩展，成为淮河流域夷人势力的首领，作为东方夷人的代表并与周抗衡。春秋时期的徐国夹在齐、楚、吴三个大国之间，不时遭到它们的征伐。徐王时而嫁女于齐侯（见《左传·僖公十七年》）；时而又娶吴王之女为妻（见《左传·昭公四年》）；时而又送太子入质于楚（见《左传·昭公六年》），依违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最终还是难逃亡国的命运，在公元前 512 年为吴所灭，徐王章禹率从臣奔楚，被楚子安置在夷，即今安徽亳县东南。此后，徐国便渐渐从历史上消失。

徐从商初立国，到春秋末期灭亡，成文史达一千余年之久。如果加上立国前的成长时期，则有更长久的历史。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江淮一带起过重要作用，为这一区域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南方地区吴、越、楚，以至岭南地区民族文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及其

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关于徐国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商代甲骨卜辞与西周、春秋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只有简单的征伐徐夷、淮夷的记载。在《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及三《传》、《荀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以及稍晚的《淮南子》、《史记》和《后汉书》中对徐国的零星记载，内容也大多仅限于征伐之事。

商周的灭亡与以徐夷为首的东方夷人的反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所谓“纣克东夷，遂殒其身”的说法，西周王朝也始终为徐、淮夷的不断反抗所困扰。在商周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强大的徐夷集团始终是一支足以与其抗衡的势力。传统的史书以商周为正统，故他们所关心的只局限于与徐国的争斗，加之相隔较远，西土人士对春秋以前徐国的状况也不能有真正的了解。有些记载甚至夹有神话的荒诞成份，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徐偃王有筋而无骨”之类。故史书中很难看到徐国内部的真实面目。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从实物上证明了徐国文化的发达，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广大的。但这些徐国考古材料多出于徐国本土之外，而且大都为零散出土，系统性不强，较难反映出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如上所述，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导致了徐国史研究必须主要依赖于考古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考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徐国考古材料的缺乏正是徐史研究长期处于滞后

状态的重要原因。比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就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问题，如果没有徐国城址的发现，仅凭文献记载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徐国墓葬的出土，我们也很难对徐国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情况，直到 1993 年才告结束。1993 年初，江苏省邳州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①；1995 年夏，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②；同年，南京博物院等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③；1997 年 11 月～12 月，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④。这一系列发掘连同 80 年代初在生产建设中遭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号、三号墩，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徐国青铜编钟及其它青铜礼器，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有了这批材料，我们就有条件能够比前人更深入地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更完善地建立起徐国器物的标准器群，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断定徐国器物的相对年代。我们相信这一系列发掘将会激起人们对徐国史研究的兴趣，使徐国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① 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5 期。

② 盛储彬、姚景洲：《梁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中国文物报，1996 年 8 月 4 日，第 1 版。

③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 年第 11 期。

④ 刘照建、吴公勤：《邳州市九女墩四号东周墓》，见《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8 年》，文物出版社，2000 年。

由于以上发掘材料大多仍在整理过程之中，很多重要材料尚待发表。这里笔者主要就自己参加发掘所获得的，以及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一较详细的介绍，并根据这批材料对徐国史和徐国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摘要)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徐国王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论证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证明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本文还参照有相对纪年的具铭徐器,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作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 306 墓、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钺》、《虬巢钟》、《王子婴次炉》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全面比较,得出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还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

同时又联系徐淮一带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遗址，对徐文化的渊源作了初步的探讨，并初步分析了徐文化的特征，认为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的因素而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最后对徐舒关系及徐偃王的传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邳州九女墩封土墓 金文 青铜器 文化因素 春秋时期 徐国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Xu State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based on the archaeology materials which were unearthed from several Jiunudun mounds, Liangwangcheng & Eyacheng sites in Pi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A large number of ritual bronze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pottery vessels, jades and stone artifacts were unearthed from Jiunudun mound No. 2 , No. 3, and others. Among these treasures knobbed bells bear “ ‘the Xu king’ ’ s grandson”, “ ‘the Gong king’ ’ s grandson” and other inscriptions. In the light of releve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material remains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Jiunudun tombs, Liangwangcheng & Eyacheng sites were all concerned with activities of the Xu people in the vicinit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at the tomb – owners must have belonged to the royal aristocracy of the Xu State.

Then the author makes a systemic and thorough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types and decorations of Xu State bronz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new view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bronze culture of the Xu State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ossesse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For example, the bronze from Mound No. 3 at Jiunudun contain elements of many cultures. In type, there are the ding tripod with an inverted dish – shaped cover, the swing – chained pot and the covered

dou stemmed vessels commonly seen on contemporaneous vestig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Qi and Lu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among the finds are the Tang ding, zun vase, dragon - head - shaped he tripod and fou pot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neous tombs of the Wu and Yue states. Another type of bronze object is the animal - head ding previously yielded mainly from the territory of ancient Shu ethnic group. Moreover, there is a batch of bronzes typical of the Xu State, such as the chime - bells decorate with winged - animal - shaped scrolls, ear - less leg - less washing basin, burner tray with the base on a post - shaped ring foot. In decorative style, one can see elements of the Rong and Di cultures.

In the end,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origi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u culture, he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u and Xu, and explains the legend of Xu Yanwang in a new way.

Key words: Jiunudun mounds, of Pizhou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bronze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Xu State

绪论 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

徐淮夷在先秦时期常被中原人士视为叛逆的典型，如《左传·昭公元年》有这样一句话：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壺乎？

作为夷人势力代表的徐国，其之所以在商周时期屡次与中原正统王朝发生冲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夏商周时期，在蛮夷戎狄四裔非华夏人中，夷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最高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的对外关系几乎全部都是与东方夷人的关系，夷、夏之间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夷人还一度夺取过夏人的政权，除了战争之外，它们之间也有长时期的和平相处。夷人同商周王朝的关系也是时战时

和，商王纣曾拥有亿兆夷人，最后还是因为夷人临阵倒戈而身死国灭，周人虽多次征伐徐淮夷，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心腹之患，相反倒不得不承认徐人僭号称王的既定事实。如《后汉书·东夷列传》：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由上可见，东方夷人在先秦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正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恢复夷人历史和本来的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在夷人族群中，以徐人势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活动时间最长，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在有关夷人的文献材料方面也以有关徐人的最为丰富，因而要想了解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徐夷无疑是一个最理想的研究对象。研究徐国的历史和文化会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夷、夏从相互争斗到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方诸国尤其是吴、越、楚、群舒与徐国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前人在徐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由于史料的极端匮乏，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解放前，只有徐中舒、徐旭生、郭沫若等少数几位著

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国铜器作过一些讨论，解放后也只有顾颉刚、蒙文通、李学勤、陈公柔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国铜器略有涉及。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各有独到见解。下面将他们在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徐中舒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作的毕业论文《徐奄、淮夷、群舒考》^① 中对薄姑、徐奄、淮夷、群舒之间相互关系有着精辟的分析，认为这四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尤其指出，“春秋淮南之地有群舒之国：曰舒、曰舒黎（或曰黎）、曰舒庸、曰舒鸠、曰英、曰六、曰宗、曰巢，皆徐之别封也。以文字言之，舒为徐之讹字……以地理言之，徐与舒壤地相接，又同为从齐、鲁南迁之民族。……故由文字、地理及南迁之迹观之，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不待言也”。这个观点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有颇多吻合之处。

徐旭生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② 中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徐国历史上诸如徐偃王、徐楚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对与徐国相关的史料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他认为“‘徐’‘舒’二字，古不只同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说群徐。别部离开它们的宗邦，还带着旧日的名字：住在蓼地的就叫作舒蓼，也就是徐蓼；住在庸地的就叫作舒庸，也就是徐庸。这一群带着舒名的小部落全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离开宗邦的时候稍久，所用的字体也许小有不同，由于不同的字体记出，群徐也就变成了群舒。这些部落也各有君长，但全奉徐为上国，大约没有

① 徐中舒：《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疑义”。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①一书中，对徐国青铜器和徐国文化有着很高的评价，他在《初序》中写道，“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旧文献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证乃出于周人之敌忾。徐楚均为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为敌国，此于旧史有征。而于宗周彝铭，凡周室与‘南夷’用兵之事尤几于累代不绝。故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实商文化之派演”。

顾颉刚先生在《徐和淮夷的迁留》^②一文中对徐和淮夷的迁徙、流变作了详细的考证，并在潘光旦先生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徐与浙、闽、赣一带畚民的渊源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③的结语中指出，“徐戎久居淮域，地接中原，早通诸夏，渐习华风……徐衰而吴、越代兴，吴、越之霸业即徐戎之霸业，吴、越之版图亦徐戎之旧壤，自淮域至于东南百越之地，皆以此徐越瓯闽之族筭路蓝缕，胥渐开辟……”。蒙文通先生的这一论断值得重视，它正为江浙地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④一书和《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⑤一文中结合文献首次对从纣王到章禹共五位徐王的世系作了排列，并对若干徐器进行了科学的分期、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 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1990年。

③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

④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⑤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见《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断代；他在《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①中指出春秋时期，以徐国为代表的南方列国青铜器铭文与中原和北方相比一个重要差异是，南方列国铭文“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先世的名号，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少数还有记出其它血缘关系，以至君臣关系的”。

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②一文中较系统地对徐器的纹饰、形制作了类型学的研究，他将徐国铜器分为四群：徐王鼂鼎器群，庚儿鼎器群，徐王义楚器群和鬲鼎器群；将徐国铜鼎分为沿耳浅腹鼎，附耳深腹鼎和汤鼎三类；将徐器纹饰分为兽面纹，蟠虺纹与蟠螭纹，以及三角纹填以勾线云纹三类。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研究徐国青铜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篇论文。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河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每当有徐国铜器出土或发现时，总会有一些研究徐国史和徐国铜器的文章紧接着发表，如彭适凡、曹锦炎、董楚平、刘彬徽、李家和、刘诗中、顾孟武、李修松、万全文、王迅、李世源等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均颇有见地。

彭适凡先生在《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③中首次依据徐器铭文的字体特点将若干典型徐器分为四期。他在《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④中，根据徐器铭文材料对盥盘、

① 李学勤：《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8年。

② 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8年。

③ 彭适凡：《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文物》1983年6期。

④ 彭适凡：《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2期。

炉盘及炭箕等类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规范。

曹锦炎先生在《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①一文中通过对绍兴 306 墓所出铜器进行分析,认为该墓与徐人势力进入浙江有关。他在《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②和《越王姓氏新考》^③中,结合考古、文献、方志等多方面材料,证实郭沫若先生关于“春秋初年之江浙,殆尤徐土”的推论,还证实了越王室与徐国的(者旨)诸暨氏有关。

董楚平先生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④一书中对徐国金文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对若干铭文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还在《金文鸟篆书新考》^⑤一文中首次对带有鸟篆铭文的《徐王义楚剑》作了介绍。

刘彬徽先生在《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⑥一文中,从器物的组合、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吴越铜器与徐楚铜器作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并根据器物的形制、纹饰特点指出出土于六和程桥 M1 的臧孙钟、M3 的罗儿匜当是“铸器于吴国,而器主之族属则为徐人”,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李家和、刘诗中先生在《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⑦一文中对部分徐器作了分期,并根据徐器的出土分布情况对徐人的活动地域进行了探讨,认为“春秋中晚期以降,徐人不

① 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1期。

② 曹锦炎:《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

③ 曹锦炎:《越王姓氏新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中华书局。

④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⑤ 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12卷第1期,1994年。

⑥ 刘彬徽:《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8年。

⑦ 李家和、刘诗中:《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1期。